



# 从僮人到壮族

## ——20 世纪以来对广西壮族论述的变迁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1)03-0117-10

● 卢 露

[摘要]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活着一千六百多万的壮族人口。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相对分散的僮人并不是一个独立而统一的族群。至少在十六年前,僮和汉、苗、瑶还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一个族群。在国家进行民族识别和成立了自治区以后,现代壮族开始具有了统一的认同。改革开放以来,壮族知识分子及其他成员都骄傲地认为,壮族是一个古老和具有丰富文化的少数民族,并且在更高层次上认同于中华民族。所以,考察关于壮族的论述和壮族族群认同的变化,对于我们研究民族政策和建设公民社会都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壮族;民族政策;族群认同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识码] A

### 一、民国时期的僮人及其与汉人、苗人的关系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民族研究方兴未艾,从“民族”的定义到“中华民族”的历史,均有许多论著问世。在这样的时代和学术背景下,也开始出现了关于广西僮人的研究,其中较有影响力的几本学术著作是:刘锡蕃(刘介)的《岭表纪蛮》(1934 年),徐松石的《粤江流域人民史》(1939 年)和《泰族僮族粤族考》(1946 年)。这些著作突破了传统地方志的体例结构,在以实地调查资料为主体的基础上,对历史文献进行了考据梳理,并且还普遍接受了当时学界流行的僮汉“同源同种”的观点。罗香林等学者也同样主张“百越”起源于“中夏”(华夏)说。在此,作者首先对这些著作的基本论点进行梳理。

#### (一)关于僮人起源和迁移史的论述

当时的学者通过实地的调查和考证,普遍持有的观点是僮、苗、侗等的先民是南方的土著居民。另一方

面,与民国特殊的时代背景相联系的是,他们甚至接受了关于中华民族起源的“中国人种西来说”<sup>①</sup>这一流行观点,认为僮汉两族同源同种,在分化之前的远古时代,居于中亚地区,后来汉蛮同时向东方迁移,其中汉族居于肥沃的中原地带,各蛮族则分散南下。

徐松石在其著作《粤江流域人民史》第五章中提到:“范大成《桂海虞衡志》说僮是南丹庆远溪峒的人民。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说僮是旧越人,《桂省通志》谓他们性喜撞突,所以称之为‘僮’。”<sup>②</sup>徐松石认为:范的说法虽对,但认为僮存在于桂西的南丹地区,包括的范围太小;只有顾谓僮为旧越人,即古代两粤大河流域的土著都是僮人,是对的。同时,他还提醒读者:“万不要以僮僮身裁短小,与华北汉人不同,便说他们不类汉人。其实华北汉人已经杂有匈奴突厥蒙古鲜卑契丹辽金的血统。纯粹的汉人体格,还当求之于苗僮僮族。这是苗僮僮三个部族很荣耀的一件事情。”(徐松石,同书第五章)

关于僮人迁移和繁衍的历史,徐松石认为:“僮人繁殖两粤分为前后两期。第一期僮族居住两广,乃在有史以前。所谓百越,所谓瓯骆,所谓骆人,所谓俚僚,所谓乌浒,所谓土人,都是僮类。……不过这些僮人渐渐的与那些自北方来的汉族同化(例如谷永招降乌浒蛮十余万)。久而久之,遂逐步变为其民。到了元朝,中央以大军镇治两湖云南贵州,这些地方的僮人遂大批侵至广西,僮族之名遂震。不久且从广西徙入广东。这就是二期的僮族。……所以各说都不能指为不对。但就事实而论,两粤最初的土著确实多系僮族。”(徐松石,同书第八章)

徐松石认为顾炎武谓僮为旧越人,涵盖了古代两粤大河流域的论断,是最为适当的。除此之外,他还采用了地名考证法来证明其观点。在广西有不少僮音地名,这些地名不仅含着僮语的意义,还具有齐头式和倒装式的特点,例如那(水田)、板(村庄)等字冠首的两个字的地名很多,只是时代久远,连本地人都不大明了其中的意义,修撰史志的文人学士也多臆测而不太深究了。

## (二)僮与汉、僮与苗僮之间的关系

刘锡蕃(刘介)在《岭表纪蛮》一书中对僮与汉、僮与苗僮之间的关系作了一些总结,他认为汉人对待蛮人有着不同认识和等级划分,峒居(居于山区盆地)的蛮人(包括僮人)的地位次于汉人,而苗山、瑶山的蛮人地位最低。其中,僮、汉两族的关系尤为密切和交融:

故华僮两族历史上交互之阶段,始则讨伐僮寇,彼此联合,继则叛服不常,分合参半,终则参错而处,国民之权利义务,与汉人地位平衡,此所以异于苗僮两族,而其进化同化之速度,远非他族所能及。现时华僮界限,几于全泯,读书从政之人项背相望。吾人行于左右两江之间,僮人村落星罗棋布,苟非从其残留未变之语言或遗俗辨识,殆莫知其为僮。(刘锡蕃,《岭表纪蛮》<sup>③</sup>第一章)

他还将广西当地的僮、苗、僮等族按接触汉人和吸收汉文化的程度划分为“未开化”、“灰色化”和“纯汉化”(或浓色汉化)三个等级:

吾人若区别各个蛮族所居住地盘之性质,则未开化之蛮人,多聚落于烟云盘旋绵邈无际之土山地方,其人多为苗、僮、抄、侗及少数之僮族,即是谓之“苗山”“僮山”,灰色化之蛮人,多聚落于深穹险恶或荒僻幽旷之石山陵谷地方,其民多为侬、僮、僚、僮诸族,是即谓之“僮峒”“僮峒”(或简称峒蛮)。若丘陵原隰,平畴沃壤,与城市交通之地,则皆为汉人与较少数“纯汉化”或“浓色汉化”之蛮人所居住。此

① 沈松桥认为,从晚清中国内部的政治形势与族群关系来观察,“中国人种西来说”亦自有其另外一层的现实政治作用可言。“中国人种西来说”的一掺入,黄帝时代的战争,就由皇朝战争一变而为民族之间的征服战争。在这样的历史意识形态下,汉族基于“历史之本质”,自应高踞支配、宰制之地位,而为中国国族独一无二之主体。这是一种以革命排满为鹄的,从而将高度种族主义化的黄帝符号化作中国国族历史记忆之核心的做法。参见沈松桥《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民族研究通讯》2010年4月第65期,原刊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12月,页1~77。

② 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39。

③ 刘锡蕃,《岭表纪蛮》[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

等分野最为显明。……广西之蛮族如此，即滇黔之蛮族亦如此。此实为西南全部蛮族各在天然法则中演进而成之一般现象。（刘锡蕃《同书》第三章）

所以，刘锡蕃的这本《岭表纪蛮》也被视为政府治蛮和实施开化政策的指针。当时的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在此书序言中写道：“百寿刘君锡蕃著《岭表纪蛮》一书，不袭陈言，别开生面，而以身历其境，所得事实引证靡遗，尤为难能可贵。吾省此类民族，实繁有徒，现在从事开化，使齐平等，执斯篇以为治理之指南针也可，即以其风俗习尚研究民族之真谛，亦无不可，质之当世君子，以为何如？”（刘锡蕃《同书》序）

不仅如此，刘锡蕃还根据“蛮人落后，处于劣势地位，应该通过教育加以改变”的观点，采取了具体措施，成为广西关心和提倡特种民族教育的先声。在1932年春，发生了桂林五县瑶民暴动后，当时的广西省政府和教育厅更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1935年，刘锡蕃在桂林主持开办了广西特种师资训练所，在《训育大纲》中，他说：“对于学生的选取，由于我壮族人口较多，文化较高，他们的子弟，随时都可以进入所在地的各级学校，仅着重瑶、侗、苗、彝等族，边远县份的壮族，其文化等于瑶、侗的，也酌量录取。课程主要以汉语和社会常识为主。”<sup>①</sup>徐松石曾对此评论道：“当日这些青年学生，一律穿上广西通行的学生服装，精神焕发，器度轩昂。当他们与其他学校学生一同聚集的时候，若非预先宣布，绝对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僮人和侬的青年子弟。”（徐松石《同书》第六章）

后来有不少学者评论，刘锡蕃的特种教育以及民国广西政府的开化政策是为了“同化”<sup>②</sup>僮、苗、瑶等少数民族而实施的，并没有摆脱传统的华夷思想和进化论。当时在新桂系政府主政的李宗仁、白崇禧和黄旭初等人基本认同“五族共和”以及后来的“中华民族观”，与此相对应的，他们把苗人、瑶人和部分仍未开化的僮人视为“特种部族”。除了继续在这些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改良风俗习惯的措施以外，新桂系政府在面临土地和文化适应等诸多问题的特殊背景下，还邀请了费孝通等学者在广西金秀大瑶山进行考察《花篮瑶社会组织》等至今仍有参考意义的著作问世了。

在民国时期的思想界，康有为、章太炎和梁启超等人在国族构建的过程中主导的文化主义和种族主义始终在相争相持。这论争和对抗的变化进程，也影响着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和普通大众关于民族的定位和思考，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国际环境的冲击下，这种定位和思考历经了从孙中山先生的“五族共和说”到蒋介石“中华民族宗支论”的转变。当时中国共产党也在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民族理论，在借鉴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民族理论的基础上，初步形成和提出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自决等主张。毛泽东于1939年12月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他在第一章中指出：

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布依族的一种旧称）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

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sup>③</sup>

这也是壮人、仲家人、彝人等第一次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中被提及和承认，这些少数民族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重要性被肯定。而从那时开始一直到建国以后，“在中国国内‘民族建构’的立场上，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核心概念仍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继续使用，如对各传统部族（满蒙回藏等）仍称‘民族’，强调中国是一

① 刘介：我创办广西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的经过[J]，广西文史资料，第14辑。

② 黄兴涛认为，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同化”一词的使用显然很不恰当，表明使用者的认识仍存在某种大汉族主义的局限性。但也应指出，当时人们使用“同化”一词，很多时候确属一种平等融化之意上的使用，并不都着意存有汉族自大独尊之思想。此种“同化”实际上也就是“大同”化的同义语，它既是对于清末“五族大同”思想的一种继承，也体现了民初革命党和民国要人们对于民族问题新的认识水平。由于这些活动和政策宣传反映了当时社会上要求民族融合的时代愿望，因而也就有力地激励着人们去继续深化认识，进一步推动着国人对于大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参见黄兴涛《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民族研究通讯》2010年5月第67期，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评论》（香港）2002年2月创刊号。

③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A]，毛泽东选集[C]（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个‘多民族’国家等等。”<sup>①</sup>

## 二、从落后到平等：社会主义制度下关于壮族论述的新模式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1950年至1952年,中央先后向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和内蒙古等地区派出了民族访问团,开始对民族地区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开始初步的民族识别工作。当时划分民族的标准,主要根据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除根据这四个基本要素外,当时的民族识别还重视各民族的历史来源调查和尊重少数民族群众自身的意愿,所以在1953年,汇总登记下来的民族名称据称有400多个。这也反映出,在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人的族属意识是笼统而模糊的,经过几千年的迁徙、交往和通婚,许多族群不断地在分化和融合,有些族群的称谓发生了改变,有些族群则融入了其他族群。所以,中国的民族支系及其称谓纷繁复杂。当时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少数民族人口不过3500万人,搞成400多个单位对于民族的发展和融合是不利的。针对这些情况,1953年到1957年,对各民族单位进行了实地调查。这项工作一直进行到1979年以后,最后到1990年,中央公布,中国包括汉族在内的民族一共有56个。

1951年7月至11月,中央人民政府派出以费孝通为团长的中央政府代表团到广西各地对当地各民族的来源和变迁进行考察,后来认定壮族是广西的土著居民,瑶族、苗族则来自长江以南的两湖江西等地。费孝通后来回忆:

1951年,我参加了中央访问团到广西去访问各兄弟民族,遇到了一个具体问题,就是广西600多万的壮人是不是少数民族的问题。我参加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根据斯大林民族理论,从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等四个特征,肯定了壮人是一个少数民族。但是壮族这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是怎样在历史上形成的呢?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心上。<sup>②</sup>

广西有一种人自称为土人,或本地人,分布很广,除了东南角靠近广东的10多个县外,没有一个县没有土人。说土话的土人中有部分承认是壮人,如桂北地区,特别是边地,如龙胜、三江一带和苗、瑶、侗杂居,被视为少数民族的地区。在土人占多数,社会地位较高,又有苗、瑶等人杂居地区,土人不承认自己和苗、瑶同属少数民族,而认为是“说壮语的汉人”。<sup>③</sup>

虽然,当时费老是根据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来肯定壮族是一个少数民族,但他也强调,语言具有变动性,所以识别民族既需要依靠语言分析,又不能单独依靠语言。在民族识别中,他还特别强调“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而且承认对这个特征的理解还不够深刻和全面,只以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社会生活方式、宗教仪式上的所谓“特点”来作为识别的标准,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他对民族识别工作的反思,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

1951年,中央民族访问团在对少数民族地区慰问的同时,还深入壮乡瑶寨作了大量的历史调查,黄现璠以广西分团副团长的身份参与了慰问和调查工作。此后,他曾组织和参加过数次深入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实地调查活动。在此基础上,他曾经撰写过两本著作,1952年的《广西省大新县僮族调查资料》(内部资料)和1957年的《广西僮族简史》(初稿)。这两本书都具有纲领性的意义,不仅在体例上开创了壮族“革命斗争的历

① 马戎.21世纪的中国是否存在国家分裂的风险[J].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2010,(75).

② 费孝通.开展少数民族地区与与少数民族历史有关的地区的考古工作[A].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C](上卷).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203~204.

③ 费孝通.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A].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C](上卷).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90.



史”还根据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四个标准总结了壮族的民族特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前所没有的。他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况调查提纲,假定广西壮族的发展阶段处于初期封建社会。<sup>①</sup>他在前一书中说:

我们为什么以大新为试点?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发给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调查提纲,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初期封建社会三种。我们假定广西壮族社会历史情况,土司统治时期,是属于初期封建社会,所以调查之初,即在各县过去有土司统治之地区。调查之后,认为大新县属,过去曾有八个土司,镇都县属,过去也有八个土司,都合于做试点。德保、上金等县,以土司较少或改流太久,除某些风俗和遗迹外,土司统治之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等都比不上大新、镇都,不能作为试点。……解放前,这里对民族名称,多不明确,一般都称自己为汉族。只有边境上,因衣服异于别地,而被歧视。如称上甲人为“上甲佬”。此外,倒是有依习惯而称为客家和土家两种。<sup>②</sup>

《广西僮族简史》(初稿)虽说是“简史”,但论述范围较为广泛,内容包括僮族的分布及起源、社会组织、革命斗争、生产劳动和生活习尚、文化艺术、语言文字、解放后僮族人民生活之改善和各种事业的发展。其中,论述新中国成立后僮族人民生活改善和建设成就的篇幅比较多。后来《壮族简史》编写组编写的《壮族简史》(1963年初稿,1980年正式出版)也延续了这种论述模式。同时,1956年,黄现璠参与组建了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这两本著作中关于僮族当时处于初级封建社会的历史阶段,以及僮族起源、分布、社会组织、生产生活习惯的论述,也成为当时社会历史调查的指导思想和调查提纲。这也体现在后来出版的“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丛书当中。《广西僮族简史》(初稿)说:

广西僮族,究竟是土著,抑或外来?首先要说明,解放后,广西博物馆在广西僮族地区之来宾,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五万年)人类头骨化石,在柳江发现两件骨器,大新发现几颗人类牙齿化石。据古生物学家研究,相当中国猿人一个时代,距今约有五六十万年。新石器时代(距今约四至六千年)遗物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物等,在大新、扶绥、龙津、武鸣、上林、东兰、邕宁、隆安等地,都有发现。由于这些远古遗物和人类化石,证明了广西僮族地区,早已有人类居住。这些人类,考古学家,虽不能断定是什么民族,但可能就是僮族。<sup>③</sup>

壮族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并没有公认的统一的称谓。在建国以前学者的论述当中,僮人一方面比苗瑶人接受了更高层次的汉文化,另一方面,他们的贫穷落后现状与汉人统治者(包括土官)的长期压迫有关,所以,历史上的僮汉关系一直处于既交融又对立的复杂矛盾之中。而建国后,由于受到了苏联和斯大林民族观的影响,学者对于壮族的认识,更强调阶级对立的一面。《广西僮族简史》(初稿)说:

僮族人民,甚至汉族人民,对于这样四个特点,都没有完全具备。因为中国历史未经过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所以僮族和其他民族,在解放前,是否可以称民族,抑或称为部族?这是关系较大,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因为一个“人们共同体”,不管它是氏族部落或部族,多少总具有他们之特点、特殊性,为其他“人们共同体”所没有。而且斯大林同志所说的民族四个特点,也不是从天降下,必在它构成以前的“人们共同体”生活内部,慢慢滋长发展起来。僮族人民,纵是部族,不是民族,也有它之特点、特殊性,并且一向表现得相当显著。(黄现璠,该书第五章)

在社会历史调查之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民族学和语言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开始对分支较多的壮族进行语言、生产方式、风俗习惯和历史变迁方面的深入的实地调研,发现壮族有“布土”、“布雅依”、“布依”、

① 林耀华在《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中指出:“民族是个历史范畴,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斯大林的四个特征是指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考虑到中国的国情与中国民族的实际,应看到多数民族在解放前尚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上述各特征正在形成之中。为此,民族识别工作又不能生搬硬套、教条主义地运用斯大林提出的四个特征,而应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参见林耀华,《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J],《云南社会科学》,1984,(2)。

② 黄现璠,《广西省大新县僮族调查资料》[Z](内部资料),1952。

③ 黄现璠,《广西僮族简史》[M](初稿),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57,2~11。

“布壮”、“布傣”、“布沙”、“布偏”、“天保”(自称“布侬”)、“黑衣”(自称“布雄”)等12种称呼。“布”是“人”的意思,这些称呼都是壮族内部不同支系的名称。<sup>①</sup>作为55个少数民族中人数最多的民族,壮族的分布呈现的是一种典型的“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在一些地区,壮族还与周边的汉、苗、瑶等族群处于“分而未化、融而未合”的状态。广西壮族的分布面很广,在城镇和农村、山谷和平原都有分布。从桂东到桂西,分布的密度逐渐加大,在桂东和桂东北的一些地方,壮族人口只占百分之几甚至零点几,但在桂西靠近中越边境的靖西、那坡和德保等县,壮族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95%以上。在广东、云南和贵州,也有一定数量的壮族分布。壮族分布的这些现象的历史根源多种多样。有历史和考古资料证明,壮族起源于南方百越民族中的西瓯、骆越部落,并在以后的不同时期有乌浒、俚、僚、徭、獯等不同称呼。而公元219年,秦始皇派50万大军进攻岭南,进入广西境内的秦军开凿灵渠,开始了汉人迁入广西的历史。此后,汉人进入广西的方式主要有:(1)戍兵。除了秦始皇征服岭南发兵50万,此后大规模的戍兵还有:东汉光武年间,马援将军率兵南征交趾后在广西境内留兵戍边;北宋仁宗年间,狄青率领数万大军征伐侬智高后,留下戍兵逾2.4万人;明代,广西僮僮人发动了八寨起义、古田起义等,朝廷征调大军围剿,事后均留兵戍守。(2)流民。古时每逢中原地区发生战乱灾祸,不少难民便纷纷举家避入广西,占籍为民。难民流入广西地区,直到抗战时期仍有记载。(3)流犯。自古以来,广西被中央王朝列为南蛮和烟瘴之地,是流放罪人和贬谪官吏的地区之一。(4)农、工、商。历史上广西地广人稀,吸引了许多汉族农民迁徙到此开发荒地,同时也吸引了内地工商业发达地区的工匠、商人来落户经营。<sup>②</sup>

这些迁入广西的汉人除带来了中原文明外,也在语言、风俗习惯、生产生活等一些方面接受了当地的特点。与此同时,广西当地的土著居民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汉人迁入所带来的中原文明。壮汉互相融合的历史过程对今天研究壮族的认同意识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建国后实行的民族识别,对于广西壮族的认同意识和族际关系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人口众多的“自在”群体因为有了统一的称谓,在与汉、瑶、苗等族群交往过程中,身份边界也逐渐清晰。当时的民族识别作为一种国家行为,的确有着不可抹杀的政治因素。

1951年,主要参与识别壮族的费孝通就曾认为:“中国少数民族有它的特点,就是相互的关系深得很,分都分不开。以壮族来说,壮族同汉族就很难分嘛。我1951年到广西,壮族就说‘我们是汉族’。这是为什么?因为长期以来,在大汉族主义之下,民族意识受到压制;另一方面,的确壮族同汉族分不大清楚,长期以来接受了相同文化。至于其他民族也一样,只是程度不同而已。”<sup>③</sup>

民族划分和族群名称一旦形成和确立,即会产生一定的固定形象(image)和符号象征(symbol)意义,成为人们相互认同和进行社会动员的工具。有学者认为,“民族意识”(ethnic consciousness)包括“族属认同”(ethnic identity)和对自己所属“族群利益的感悟”两个部分。(王希恩,1999)<sup>④</sup>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族群的族属意识呈现了日益增长的态势,民族识别及后来政府对民族成分申报相对宽松的政策,不仅使得许多族群的人口在数量上绝对增强了,客观上还促进了族属意识的增长和族群身份边界的强化,55个少数族群逐渐由认同意识和他者边界都相对模糊的“自在”群体向“自觉”群体转化。而且,如今我国还面临着民族意识在世界许多的多民族国家内部都在增长的外部事实。当官方意义上的“民族符号”逐渐成为精英分子甚至大众寻求文化、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因素的时候,中国如何能继续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框架下很好地实现政治和文化整合,是值得我们每一位中国人都要思考的问题。

工具论是一种曾流行于西方学界的研究族群关系的视角,被较早地用来研究、解释中国的族群认同。该理论隐含着目的性很强的功利主义,使用“报偿交换”等互惠关系的工具理性视角来分析国家和各族群的精英及大众的关系。而按照被广泛接受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下的定义,民族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

① 黄光学,施联朱.中国的民族识别——56个民族的来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65.

② 范宏贵,顾有识.壮族论稿[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38~61.

③ 费孝通.费孝通民族研究论文集新编[M](上卷).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469.

④ 王希恩.民族过程与国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142.

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sup>①</sup>在新的时代观念和“印刷资本主义”的推动下,民族填补了因君主制和宗教衰弱而留下的空间。然而,过分强调“建构论”不免太凸显人的主观性,而忽视了中国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素及其与人的选择之间“互构”的一面。西方学者研究我国西南族群关系的著作,涉及广西壮族的不多,比较有影响力的是哈罗德·韦恩斯在1954年出版的《中国向热带的拓展》和莫斯理在1973年出版的《为了中国南部边境的稳定》。美国学者白荷婷于2002年出版的《创造壮族:中国的族群政治》一书指出,壮族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出于维护岭南的政治稳定的目的而“自上而下”地创造出来的民族。被识别出来的壮族原来既无共同文化和历史来源,亦缺乏彼此间的认同。如今壮族内部各支系和小群体的精英或大众,已基本认同“壮族”。她采用工具理性的分析范式,认为壮族内部的精英分子利用这种统一的认同来向中央政府要求更多政治、经济权益。(白荷婷,2002)<sup>②</sup>

彝族同样属于西南一个包含众多支系的民族。郝瑞在对彝族的研究中,通过实地的考察和分析,对长期以来几种主导的解释范式——包括工具论、原生论和建构论等——的恰当和不恰当方面进行了阐明。他指出:“中国对民族识别的介入,由于其民族定义完全建立在文化标准上的,这些标准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展示出其生命力。我们的确发现把文化标准作为成员族属之实际根据的情况,至少是确定成员族属的第一条件。另一方面,既然一旦国家确定了民族,民族就具有永久性,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文化特征对于民族来讲,将越来越不重要,这将再一次把地盘留给原生论与工具论的解释。”<sup>③</sup>虽然从晚清民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民族政策和民族识别不免受到西方的民族主义和苏联的斯大林式民族理论的影响,然而,中华民族的形成历史是长期以来各民族不断融合的历史,其进程还在延续。近代以来,受到整个国际社会和政治的历史大背景的冲击,国家一方面在族群身份赋予和民族政策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也无法忽视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同样,在考察和理解壮族的民族识别和族群认同的时候,就不能不考虑更为广阔的社会场景和历史维度了。虽然“壮族”称谓在今天已被壮族内部各阶层、各群体逐渐认同,但是,壮族形成的历史本身还蕴含着地方文化与中原文化不断交融的壮汉关系、边界逐渐清晰化后的中越关系,壮族的族群认同始终有许多值得探究的张力。

哈贝马斯曾指出:“只有当国民转变成为一个由公民组成的民族,并把政治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才会有一种民主的自决权。但是,对‘臣民’的政治动员要求混杂在一起的人民在文化上实现一体化。这一点是必不可少的,……借助于民族观念,国家成员超越了对村落和家庭、地域和王朝的天生的忠诚,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集体认同。……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体系建立了一种多少带有想象特点的同一性,并由此让居住在一定国土范围内的民众意识到他们的共同属性,尽管这种属性一直都是抽象的,只有通过法律才能传达出来。”<sup>④</sup>近代以来,不少有识之士,包括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也致力于从国家层面上建立认同,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仅停留在以国家为现实基础的现代“国民”认同的水平上,还远远不够,必须以传统文化、历史记忆(包括血缘等)的密切联系为依托,来超越传统的族群界限,把各族群所共享的集体认同从抽象化为具体。这不仅是中国走向现代公民国家的关键所在,也是形成一个超越“国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义所在。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也曾基于民族合作和经济发展的考虑。在1957年3月25日全国政协召开的“邀请广西籍人士协商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会议”<sup>⑤</sup>上,周恩来指出:

①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M].上海:世纪集团出版社,2005.6.

② Kuap,Knatedne Palmer 2000,Creating the Zhuang Ethnic politics in China,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③ [美]斯蒂文·郝瑞,巴莫阿依、曲木铁西译.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27.

④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曹卫东译.后民族结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76

⑤ 1965年,周恩来总理建议把“僮族”的“僮”字改为“壮”,“僮族”称“壮族”。因为“壮”为健壮、茁壮的意思,意义好,又不会使人误解。



向少数民族还债的说法是可以说的,我国历史上事实存在着大汉族主义,汉族处于优势,得到了发展,少数民族处于劣势,不易得到发展,而且常受到欺压,所以应该讲还债,汉族应该帮助少数民族共同发展。<sup>①</sup>……有人说僮族特点少,僮族留下来的历史痕迹是比较少些,但不能说比满族少,僮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化,这些都是它的特点。鉴于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居住地区也很集中,建立省一级的僮族自治区显然是必要的。

在关于成立僮族自治区的两个方案上曾有过辩论,即:一个是在广西省的建制基础上,改建广西僮族自治区,称为合的方案;一个是把广西一分为二,东部保留广西省的建制,西部建立省一级的僮族自治区,称为分的方案。周恩来指出:“广西汉族人口多,占的地方小,僮族人口少,占的地方大。将来发展工业、扩大农业,大部分在少数民族地区。可见合则两利分则两害。”<sup>②</sup>

1957年7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的议案:撤销广西省建制,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1958年12月11日,广西僮族自治区正式成立。这里世居有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彝、水、京、仡佬等12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8%。壮族90%以上的人口聚居在广西,约占广西总人口的34%,居住面积占广西总面积的60%。当时中央政府的这项决定主要是基于民族合作和民族发展,更好地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所以,在广西僮族自治区成立以后,针对广西经济落后和基础设施薄弱的现状,中央实施了几项具体的措施,主要包括:帮助建设三大项目,即西津水电站、柳州钢铁厂和柳州化肥厂,通过财政拨款兴建广西边境的中小型农田水利、公路、桥梁、学校等,建设广西最大的海港——防城港。1957年,国务院第63次全体会议正式批准了《僮文方案》。在文化教育方面,不仅多年来在升学上对自治县考生和少数民族考生降低5至20分录取,还实行了优先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政策。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50年来,在中央各项优惠政策的扶持下,各项事业均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过去那种农业比重过大、工业基础薄弱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农业化逐步向工业化过渡,经济类型开始向多元化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泛北部湾经济区和广西南宁国际民歌节等提升了广西的国际声誉,也给广西带来了许多发展的契机。

### 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从“他者”到“自我”的语境下建构壮族认同的实践

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松本光太郎提出了壮族“汉人后裔意识”这一说法。他指出,在广西地区,岑、莫、许、黄、赵、李等土官的家谱都载明祖先是外省人、汉人,而且这些说法都能从《宋史》、《文献通考》中都得到佐证。而除了土官家谱外,民间的家谱和传说也有这种说法,其中比较广泛的说法:一是祖先原籍山东白马县(据近年来学者考证,实为河南滑县),随宋朝狄青将军南征侬智高而落籍广西;二是一二百年前从广东迁来的。<sup>③</sup>这些说法的真实性有待考察。松本认为,假托汉胄、伪造家谱的主要目的还是摆脱卑微的地位,实现平等化的要求,这不仅在广西地区,在全国许多地区都看得到。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新的民族政策,广西地区的壮族各支系有了一个统一的称谓,但民间还保留着“汉人后裔意识”,这也说明现代壮族内部在族群认同上有着丰富的面向。

#### (一)壮族文化的符号形象——从“刘三姐”到“黑衣壮”

自电影《刘三姐》1961年问世以来,壮族人民的勤劳智慧和壮乡山歌的风情魅力随着“歌仙”刘三姐形象

① 周恩来总理的“补偿论”(还债说),在当时的广西曾引起一些汉族干部的不理解,他们中间有人认为:“汉族欺压少数民族的是统治阶级,为什么我们要还债?”参见广西自治区档案馆档案,卷宗号X41,目录号001,案卷号0367,第73~74页。“补偿论”在当时是和反思大汉族主义联系起来的,目的是为了帮助长期处于劣势的少数民族获得较快发展,以实现各民族间平等的理念。

② 民族政策文件汇编[Z](第二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4~161.

③ 范宏贵,顾有识.壮族论稿[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115~131.



的塑造,为全国观众所熟悉和喜爱。“刘三姐故事主要在两粤民间流传,传说中的刘三姐亦称刘三妹,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可能是南宋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记载的‘三妹山’。”<sup>①</sup>电影版的刘三姐反映着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和精神风俗,刘三姐和莫怀仁的斗争暗含着阶级斗争的主线,与秀才对歌的胜利也反映了当时对劳动人民的歌颂和对知识分子的贬损。当时的电影编剧乔羽在后来回忆说:“包括我后来的《刘三姐》,那个片子在艺术上看并不是那么细致、那么精制,但它上座率那么高,我也是觉得那里头反映了一种情绪,广大观众感到了痛快,很淋漓尽致,你说艺术上有多少好的不得了的东西,不是,这是我的看法。……《刘三姐》最精彩的一场是对歌。对歌中的歌曲,大部分是民歌,《刘三姐》作为故事没什么好看的,就是这些民歌好,用了大量的广西民歌。所谓的民歌是山歌,它不是壮族的,壮歌就是壮歌,壮歌没法翻译。”<sup>②</sup>2003年10月张艺谋导演的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及2005年广西刘三姐剧团的新版大型歌舞剧《刘三姐》相继推出,这两部歌舞剧在音乐、舞美、服装、道具等方面结合了时尚和传统两种元素,为观众和旅游者打造了视觉和听觉的盛宴。这些艺术创作主要以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和获得商业利润为目的,使得“刘三姐”这一壮族文化符号成为广西文化产业的重要品牌。

黑衣壮,在20世纪90年代的广西南宁首届国际民歌艺术节上,以其原生态的山歌演绎和以黑为美的传统服饰开始登上了国际艺术舞台,其族群形象和文化开始在传媒上(央视10套等)频频亮相,被认为是壮族文化中保留最完整、最原始的“活化石”,成为继刘三姐后壮族文化形象最有影响力的代表。黑衣壮族群的身份认同,在国家话语主导权的支配和学者、大众传媒的作用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 20世纪30年代至1949年,在民国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的现代化语境下,原来居住在靖西县那坡北部的黑衣壮人被平地壮(蓝衣壮)和汉人污蔑为“黑衣人”(黑衣崽),因为其贫穷的生活水平、落后的生产方式而一直被边缘化。当时广西省政府在偏僻地区“特种部落”中推行改良陋俗的改革,黑衣壮的服饰、婚俗、丧祭等传统习俗都成为改造的对象。

2.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新中国在实行民族识别并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后,还在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优惠政策。在“壮族”这个统一的称谓下,黑衣壮人与平地壮人的差异性,在某种程度上因为生活水平和发展程度的提高而逐步缩小。“黑衣壮”之称因为带有很大的贬义,在此后很少出现,但黑衣壮聚居的那坡县大石山区(曾被联合国认定为不适于人类生存的地方)长期只能种植玉米,该县一直是百色市的十个贫困县之一,长期以来仍被外人看作是“资源匮乏、经济无潜力、人们观念不开化”的边远之地。<sup>③</sup>

3. 20世纪90年代至今,广西的文化部门和当地政府以旅游文化开发为目的而提出“黑衣壮”称谓。进入新世纪以来,广西南宁成为“东盟博览会”的永久会址,与东南亚国家交流的地理位置优越性凸现,但壮族作为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也一直被视为汉化程度最高的少数民族。为了能与西南各少数民族聚居省份的博弈过程中增强广西民族特点的“软实力”,广西学术界的“壮学热”逐渐兴起,人类学、民俗学等领域的学者先后对黑衣壮的民间记忆、族内婚制、丧祭仪式等进行了考察论证,更进一步展示了黑衣壮族群丰富的文化内涵。

从刘三姐到黑衣壮,我们看到的是壮族人文历史不断被重写和建构的历程,这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的鲜明时代烙印和各时代的人们对某种美好精神的向往。从这个意义上说,黑衣壮族群仍是作为现代社会的“他者”存在着,尽管旅游事业带来了生活水平的直接改观,但是如何避免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黑衣壮群体成员身份认同的尴尬,仍值得我们继续关注。

## (二)从民间记忆中追寻壮族共同的祖先

现代壮族的文字是建国后在中央政府的倡导下创制的拉丁字母拼音文字,是中国民族政策中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一种体现。长期以来,壮族一直被认为是“有语言无文字”的族群。其实,在与中原地区没有发生交流、独自发展的远古时代,居住在华南——珠江流域的百越民族已开始在陶器上刻画各种符号以记录当

① 石一宁.重写《刘三姐》[J].南方文坛,2008,(1).

② 乔羽口述、董馨整理.人生最贵平常心[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4).

③ 海力波.道出真我——黑衣壮的人观与认同表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03~278.

时的生产生活场景。秦汉以后,随着中原文化的传入,生活在广西的土著居民开始借用汉字的音、形、义来构造文字,即方块形的“古壮字”。这种文字,生命力在民间,主要被用来创作和记录民歌,书写书信和宗教经文,历朝以来在广西地区通行的文字还是汉字。

在两广地区的民间,流传着姆六甲和布洛陀开辟天地、捏泥造人的神话,其中姆六甲是女性祖神。由于广西地区自古通行的是汉字,当地的神话只存在于民间麽公用古壮字抄写并流传下来的麽教经书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西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从右江流域、红水河中上游、桂西边陲及云南文山州等壮族地区,收集到民间麽教经书39种,麽经的种类繁多、风格独特又自成体系。”<sup>①</sup>广西某些地区流传的麽教具有民间宗教的性质,麽公通过念诵麽经等仪式性活动,敬请祖神布洛陀降临人间,给当地民众消灾赐福。广西田阳县敢壮山,传说是布洛陀居住过的地方,这里的群众仍保持着在每年农历三月初七到初九祭祀布洛陀的活动。除了布洛陀,姆六甲、布伯、岑逊王、莫一大王和妈勒等原本存在于民间记忆中的英雄人物,他们既有原始率真的一面,又有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气概,可谓现代壮族寻找远古记忆的最好诠释。2002年7月31日,《人民日报·华南新闻》刊登了题为《田阳发现壮族始祖遗址,专家称可能揭开壮族族源千古之谜》的消息。此后,政府、学术界和大众传媒便介入了布洛陀信仰的重建当中,其中最有传播力的构建主要发生在艺术领域和民间节庆当中,如大型史诗歌舞剧《布洛陀》的公演,广西敢壮山最大型的祭祀先祖布洛陀的歌圩。然而,在2002年之前,田阳县曾多次对此类民间信仰进行过破除“封建迷信”的扫荡行动,法事道具和经书被收缴,麽公巫婆等也被进行法制教育,这样的事例在其他地区也是不胜枚举。应该指出的是,人口众多、支系复杂的现代壮族,虽然没有统一而严格的宗教,但民间一直保持着多神崇拜,神灵依附的对象可以是树木、石头、雷等自然物,也可以是蛙、牛、鸟等动物,甚至房屋、桥梁等人造物都可以是祭祀的对象。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自古以来,广西地区的土著居民并没有自己普遍通用的文字,再加上长期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所以,现代壮族的精英群体必须从散落在历史典籍中的碎片里,寻找本族群的历史记忆,以促进族群内部的文化认同,实现从他者话语体系到自我建构的转变。这里的他者,不仅指的是中原王朝对边远之地运用的儒家治理理想,当今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同样具有他者建构的意义。尽管这与历史上的传统治理方式、对待异文化的态度相比已有了很大不同。然而,各少数民族群在处理历史记忆的当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甚至充满了尴尬。例如,宋仁宗年间被大将狄青打败的壮人首领侬智高,从正史中的逆贼变成了反抗民族压迫的英雄,明朝时被派往广西镇压壮瑶民众起义的王阳明,却又在当地大力推广了儒家的思想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在网络发达的时代,历史的书写已不仅仅掌握在具有专业知识的族群精英手中,普通的族群成员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但他们的表达往往带有些感性甚至冲动的特点。而在全球化背景下,族群文化的界定与内涵已越来越难以把握,具有鲜明的流动性和再生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者的范畴是在逐渐扩大的,其影响也是深远的。

自建国以来,中国政府开展民族识别,实行民族区域制度,这是现代国家在构建过程中将边疆地区整合入国家版图的现实需要。对于西南许多的族群来说,每个族群都被贴上了一个国家认定的民族的标签。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化,中国正处于一个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由此而引发了相当多的社会问题,民族问题就是其中相当复杂的一个问题。造成民族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国际社会的压力。我们的民族政策在社会条件变化的情况下还缺乏灵活的调整,许多问题的出现,如族群内部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的分化,已背离了政策设计的原意,而且,我国的各族群差异性很大,在新疆、西藏等地还涉及宗教问题。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既协调好各个族群之间的关系,又能在国家层面上加强各族群的国家认同,将需要我们的更多关注和努力。(本文英文摘要见P.21)

[收稿日期]2011-05-19

[作者简介]卢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9级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sup>①</sup> 覃乃昌.广西世居民族[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4.24.



go Press.

[12] Maurer, Bill. 2005. *Mutual life, Limited. Islamic Banking, Alternative Currencies, Lateral Reas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3] Miyazaki, Hiro. 2004. *The Method of Hop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4] Ong, Aihwa and Stephen Collier, editors. 2005. *Global Assemblages: Technology, Politics, and Ethics as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London: Blackwell.

[15] Ong, Aihwa. 1999. *Flexible citizenship.*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6] Rabinow, Paul. 2002. *Anthropos Toda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7] Strathern, Marilyn. 2004. *Commons and Borderlands: Working Papers on Interdisciplinarity, Accountability and the Flow of Knowledge.* Oxford: Sean King Publishing.

[18] Tsing, Anna. 2004. *Friction: the Ethnography of Global Conne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收稿日期] 2011-06-20

[作者简介] 乔治·马库斯(George E.Marcus)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民族志研究中心主任, 人类学教授。

[译者简介] 满珂, 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性别研究 / 人类学博士。  
兰州 730030

## From Zhuang to Zhuang Ethnic Group——The Changes of the Discussions about Zhuang Ethnic Group since the 20th Century

*Lu Lu*

**Abstract:** There are 16 million Zhuangs living in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The Zhuangs were not a separate ethnic group befor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n this article, through investigating the three stages of the discussions about the Zhuangs, the author studies the Zhuang ethnic identity. At least 60 years ago, the Zhuangs were at different stage of development from Han, Miao, and Yao. Moreover, most of them didn't think they belong to the same ethnic group. Until the nationality classification (minzu shibie) initiated by the country was finished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the Zhuang people began to have a common identit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Zhuang intellectuals and Zhuang people proudly believe that the Zhuangs are a minority ethnic group with ancient and rich culture. At the higher levels, they identify themselves with the Chinese nation. Therefore, studying the discussions about the Zhuangs and ethnic identity are important to the research on Minzu policy as well as the building of civil society.

**Key words:** Zhuang ethnic group, Minzu policy, ethnic identity (See P.117)